

從加爾文到韋伯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904 年和 1905 年，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發表了一篇文章，此後一直影響著關於宗教與經濟生活關係的討論：*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加爾文及其追隨者的歸正宗新教通過塑造一種他稱之為“入世禁慾主義”的特定勞動觀和財富觀，促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¹

韋伯的論證如下。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教導說，上帝自永恆中已揀選了誰將得救、誰將被定罪，任何人的作為都無法改變這一決定。這一教義在信徒中造成了強烈的焦慮，他們渴望知道自己是否屬於選民。韋伯認為，後來的加爾文派牧師教導說，在自己的天職中取得成功，即勤勉而有條理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可以成為蒙揀選的標誌。因此，信徒努力工作，以求確信一種無法靠功勞贏得的救贖。與此同時，信徒被禁止在奢侈和閒散中享受勞動成果，因為那是被定罪的標誌。其結果是一種將勤奮工作與節儉消費結合起來的生活方式，它導致資本的積累，而積累的資本又被再投入天職之中。按照韋伯的說法，這種入世禁慾主義正是推動近代早期資本主義的精神。

韋伯的論點已經爭論了一個多世紀。其支持者指出，在近代早期歐洲的商人、銀行家和實業家中，新教徒，尤其是歸正宗新教徒，

地位顯著：在日內瓦、巴塞爾、蘇黎世、阿姆斯特丹、倫敦以及胡格諾派離散群體中都是如此。其批評者則提出了若干異議。經濟史學家 Richard Tawney 在 1926 年的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中承認清教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聯繫，但認為這種影響是雙向的：清教商人的經濟利益塑造其宗教的程度，不亞於其宗教塑造其經濟行為的程度。² 另一些人指出，資本主義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在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和佛蘭德繁榮發展，許多天主教地區也發展了商業和工業，而韋伯所提出的因果機制，即預定論帶來的焦慮，難以得到證明。近來，經濟學家們認為，新教地區的經濟優勢可以用新教強調閱讀聖經所帶來的較高識字率來解釋，而與韋伯所強調的倫理因素無關。³

這場辯論無須在此作出定論。對於一本關於巴塞爾的書而言，只需指出這座城市符合韋伯圖景中的若干要素即可：一座具有嚴格道德紀律的歸正宗城市，一種勤勞、節儉和審慎的文化，一個積累資本並將其再投資的商人精英階層，以及後來工業和銀行業的發展。它也符合識字率的解釋，因為宗教改革在學校方面投入巨大。它同樣符合批評者的異議，因為正如 A 部分所表明的，巴塞爾的商業和金融機構早於宗教改革，而其商人文化則根植於中世紀的城市。宗教改革強化並改造了一種早已存在的經濟文化。

1 註釋

1. 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0 (1904 年), 第 1–54 頁, 及 21 (1905 年), 第 1–110 頁; 修訂版收入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第 1 卷, 1920 年。
2. Richard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倫敦, 1926 年。參見有關韋伯命題之爭的標準文獻。

3. 參見例如 Sascha O. Becker 和 Ludger Woessmann ,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2009 年) , 第 531–596 頁。有待核實。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from-calvin-to-weber